

论张爱玲《金锁记》的饮食书写与女性命运

欧叶叶*

目 录

1. 绪论
2. 作品《金锁记》
3. 《金锁记》中的饮食书写
 - 1) 张爱玲的“食”之情结
 - 2) 《金锁记》中的食物书写与隐喻指向
4. 《金锁记》饮食书写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 1) 曹七巧：从“被食者”到“食人者”
 - 2) 姜季泽：饮食行为暴露的虚伪本性
5. “食”的隐喻系统与女性命运
 - 1) “食”的隐喻系统
 - 2) 芝寿与长安：饮食缺席者的命运
6. 结语

中文摘要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中篇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曹七巧在封建旧家庭制度下从“被食”到“食人”的悲剧命运。历来对《金锁记》的研究，偏重于曹七巧的人物形象分析与女性意识讨论，而对小说中饮食文化的系统性考察尚属匮乏。《金锁记》中频繁出现的食物意象——麻油、糖核桃、笋干、蜜层糕、酸梅汤、饺子、盖碗茶——并非可有可无的背景道具，而是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隐喻系统。本文以饮食书写为切入点，对《金锁记》中七种食物意象进行文本细读，揭示张爱玲如何通过“食”的表层文化现象及其背后隐喻，书写人物的爱情关系与女性命运。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芝寿与长安两位女性“饮食缺席”命运的对照分析，探讨了张爱玲独特的女性书写策略。本文认为，张爱玲以饮食为语言，在味觉与情感之间建立了隐喻的桥梁，以日常之物写人性深处，完成了对

* 중국절강시범대학교 인문대학 박사수료

中国现代女性命运的一次味觉式追问。

关键词：张爱玲，《金锁记》，饮食书写，女性主义，曹七巧

1. 绪论

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的中篇小说《金锁记》问世后，便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金锁记》誉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小说¹⁾”。傅雷亦给予了颇高的评价，他称《金锁记》“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²⁾”。言下之意，即《金锁记》自诞生之日起，便不是一部寻常之作，而是承载着批评界对中国现代小说最高期待的作品。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一部作品的经典地位，并不意味着其中每一个层面都得到了充分的解读。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历经数十年而不断被重读，其原因之一，正在于其文本的丰富性与多层次性。因为，张爱玲作品的情节主要是以普通人的欲望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故事为线索的。正是在饮食起居、人情往来这些看似寻常的细节之中，张爱玲埋下了关于欲望、权力与性别的最深隐喻。言下之意，即对张爱玲作品的解读，不能止于情节与人物的显性层面，还应当深入到那些被日常生活所包裹的隐性书写之中——而“食”，便是其中最具穿透力的一个入口。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者们开始研究张爱玲及其作品，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与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关系³⁾；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主义及其女性主义思想观⁴⁾；张爱玲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分析⁵⁾等等。而韩国对张爱玲的

1)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第343页。

2) 傅雷：《傅雷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出版社，1996，第410页。

3) 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 林幸谦，〈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1998，第78-91页；宋声泉，〈在“男女”与“时代”之间——重论《金锁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9卷第4期，2020，第123-132页。

研究始于1985年，代表著作作为宣钉奎的《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与女性的本位》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张爱玲小说叙事⁷⁾；张爱玲小说现代性⁸⁾；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主义思想⁹⁾等等。

中国对于《金锁记》已经进行过大量丰富的研究。然而在韩国，关于小说《金锁记》的研究，尚处于匮乏的状态。韩国关于张爱玲的研究，如上所述，围绕张爱玲小说叙事，或张爱玲小说现代性，或女性主义思想，再或者就是分析其小说里的男性与女性形象。韩国研究张爱玲虽也是以其所有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对她的中篇小说《金锁记》的研究却不多。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文本进行分析，通过对《金锁记》中出现的表层饮食文化现象及其背后隐喻的“食”文化的解读，尝试回答：张爱玲如何通过“食”的书写隐喻人物间的关系？本文将探讨《金锁记》中的饮食书写如何在味觉与情感之间建立隐喻的桥梁，以及这一隐喻系统如何呈现出张爱玲独特的女性主义思想。

2. 作品《金锁记》

《金锁记》以曹七巧的命运为主线，呈现了金钱占有欲与情欲压抑如何共同作用，导致人物心理的逐步异化。小说的主人公曹七巧，是封建旧家庭制度下的牺牲品。曹七巧虽然出身低微，但是天性要强，是个不甘于被命运摆布的

5) 段绪懿, 〈论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形象〉, 《名作欣赏》第16期, 2009, 第91-93页.

6) 宣钉奎, 〈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与女性的本位〉, 《国际文化研究》第2卷, 1985, 第137-155页.

7) 강승미, 〈장아이링 소설의 내러티브에 대한 연구〉, 《중국문화연》제23집, 2013, 191-213 쪽.

8) 박재범, 〈张爱玲의 《传奇》, 모더니즘 소설로서의 서사적 성격〉, 《중국소설논총》제33집, 2011, 237-264 쪽.

9) 유민희, 〈여성의 삶, 그 쓸쓸함에 관하여 - 장아이링(张爱玲)의 〈금쇄기(金锁记)〉 재독(再读)〉, 《인문학연구》제97집, 2014, 185-208 쪽.

人。别人眼里的曹七巧，不仅悍泼、刻薄，而且还有着疯子般审慎与机智的恶毒妇人。对此，曹七巧却不自知，她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皆是求生的必然。她压抑着内心的情欲，一种超乎常人的戒备让她对所有人保持警惕游刃有余。她想要在此过程中，守住自己用一生换来的金钱与地位。曹七巧所呈现的生活轨迹，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步步走向人性的泯灭。整个可以说是一个女人从“被食”到“食人”的过程。但也是因主人公曹七巧的内在欲望，即对爱的渴求与对金钱的占有欲而总是对立的过程。由于曹七巧的偏执、多疑，以及畸形的自我保护意识，她未从任何一个人那里得到真正的爱与温情。因此，她与周围所有人总是处于相对立的状态。而且这一对立，作为一种线索，助长了她对身边人的控制欲，从而造成了她转而吞噬自己儿女幸福的局面。这部作品的题材，是一个女人纠结于对被爱的本能渴求和以金钱来武装自己的求生欲求之间的双重心理。张爱玲从多个角度展现了由于封建制度与宗法习俗的束缚而不能够获得正常情感满足，甚至被扭曲为加害者的某个女人的心理和行为。

3. 《金锁记》中的饮食书写

1) 张爱玲的“食”之情结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究民以食为天的国度。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饮食从来不仅仅只是营养或美味，而是包含了许许多多的言外之意¹⁰⁾。食物是一种符号，我们放到嘴里的那些东西中有极大的数量象征了（在某种意义或其他意义上）别的事物¹¹⁾¹²⁾。食物通过刺激文人们的舌尖，使得文人们会整合头脑

10) 陈平原，〈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第1期，2008，第127-137页。

11) [美]卡罗琳·考斯梅尔著，吴琮等译，《味觉、食物与哲学》，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第184页。

中所见所闻的知识，并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来阐述自己的所感所悟。创作来源于生活，恰如《礼记·中庸》中所言：“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¹³⁾。张爱玲喜“食”，不仅在生活中如此，在文学中更是如此。从她个人成长方面看，显赫家族的贵族饮食传统、上海与香港双城的文化渲染以及离散生涯的味觉断裂，塑造了她独特判等观念的形成，使得她饮食书写中对日常生活、对末世及都市幻象的关注；从创作理念来说，细节美学、苍凉意识以及现代性感官体验与哲学思辨的交织中，张爱玲看到了饮食书写的价值，也成为了她进行饮食书写的动因。¹⁴⁾因此，她的叙述手法切入点是食物、服饰、空间等日常符号，而不是那些高大上的物件，通过琐碎的日常细节，揭示时代与个体的深层矛盾。¹⁵⁾这一叙事手法可以从张爱玲创作的诸多作品中得到验证，譬如《童言无忌·流言》中提到的云片糕：“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谈吃与画饼充饥·流言》中提到的蛤蟆酥：“我母亲从前有亲戚带蛤蟆酥给她，总是非常高兴。那是一种半空心的脆饼，微甜，差不多有巴掌大，状近肥短的梯形，上面芝麻撒在苔绿底子上，绿阴阴的正是一只青蛙的印象派画像。”又如在《第一炉香》中，张爱玲便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

从词性上看，“食”，作名词时，主要是指粮食与食物；作动词时，则主要指“吃”或“赖以为生”之意。¹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五千多年文化的大背景之中，“食”还存在着众多的隐喻意义。本文便是在名词、动词与隐喻等层面之间灵活运用“食”这一概念。¹⁷⁾在张爱玲的作品里，常常能够发现“食”文化的相关描写。这一方面源于她对这些食物的喜爱，另一方面，张爱玲笔下的“食”具备上述所提及“言外之意”。

12) 陈益源主编，《谁识食滋味：文学与艺术中的饮食符号》，台北：财团法人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2013。

13) 曾参、子思著，严亚珍译，《大学·中庸》，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9，第495页。

14) 甘哲瑾，〈张爱玲小说中的饮食书写研究〉，长江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2025，第1-62页。

15)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215页。

16) 李奇志、漆咏德，〈论张爱玲的“食”之叙写〉，《理论月刊》第12期，2019，第81-87页。

17) 李奇志、漆咏德，〈论张爱玲的“食”之叙写〉，《理论月刊》第12期，2019，第81-87页。

2) 《金锁记》中的食物书写与隐喻指向

《金锁记》中的“食”，并非只是点缀情节的背景道具，而是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隐喻谱系。小说一开篇，便提到了“麻油”，丫环小双与凤箫对曹七巧的家世进行议论“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¹⁸⁾”。“麻油”这一寻常的食物意象，在此具有身份标记功能——是其底层市井出身的阶层印记。小说开篇借丫鬟嘴道出曹七巧低微的出身，她这“麻油西施”被当作货物“出售”到姜家。所谓的“嫁”，实则为“卖”；所谓“少奶奶”，实则为侍奉骨痠病人的“高级丫头”。

曹七巧出场前，姜家二小姐为给老太太做糖核桃，拿着钳子磕核桃。大太太（玳珍）、三太太（兰仙）坐下一起帮忙，有说有笑，场面一片和谐。然而曹七巧并不在这些“做食者”与“享食者”的圈子之内。从现代的眼光来看，饮食规则不是象征性的，而是关乎道德的，社会规则与阶层的¹⁹⁾。糖核桃的场景，表面上写的是姜家女眷的日常和睦，深层却在标记一种阶层的区隔——曹七巧的缺席，即是她被排斥的证明。随即，张爱玲又写到了晾在黄杨木栏杆里的“笋干”。笋干之“晾”，与七巧之被“晾”——被冷落、被孤立，形成了微妙的对应。食物成为权力流通的货币，²⁰⁾可以说，《金锁记》从一开始，食物便不是食物本身，而是人物命运的隐喻性符号。

在曹七巧与姜季泽的关系之中，食物更是成为了爱情的刻度表。当姜季泽虚假地向她表明心意之后，曹七巧“三脚两步赶出门去，到下房吩咐潘妈替三爷弄点心去。²¹⁾”潘妈拿了点心和酸梅汤上来，她亲自拿筷子夹起蜜层糕上的玫瑰和青梅，还对姜季泽说道“我记得你是不爱吃红绿丝的²²⁾”。蜜层糕上的玫瑰与青梅，指向的是爱情的甜蜜与虚幻——七巧在这个压抑的家里，把姜季泽当作了

18)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1页。

19) [英]玛丽·道格拉斯著，黄剑波等译，《洁净与危险》，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第56页。

20)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127页。

21)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15页。

22)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15页。

唯一的念想。然而，姜季泽最终只是为了得到她的钱。他在诱骗曹七巧时，“把咬开的饺子在小碟子里蘸点醋²³⁾”，平稳从容，不带一丝慌乱，显然是蓄谋已久。饺子的意象，在此暴露了男性虚伪的从容。七巧识破之后，气得嘴巴发干，从她端起盖碗茶吸了一口，可见她对姜季泽已彻底失望。最终，曹七巧拿团扇打翻玻璃杯，酸梅汤淋漓滴溅了姜季泽一身。“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²⁴⁾”酸梅汤的滴漏，在此刻宣告了她对姜季泽的爱情终结。那滴滴皆是她多年来的辛酸泪水与苦痛，滴漏越久，绝望越深。可以说，从蜜层糕之“甜”，到酸梅汤之“酸”，《金锁记》的饮食书写完成了曹七巧从爱到恨的完整味觉叙事。

如下表所示，《金锁记》中的食物意象，各自承载着明确的隐喻指向，并与人物间的人际关系构成严密的对应。

食物意象	出现场景	隐喻指向	折射出的人际关系
麻油	开篇丫环议论曹七巧出身	身份卑微、被“出售”的命运	曹七巧与原生家庭
糖核桃	姜家小姐、太太们围坐剥核桃	阶层区隔、曹七巧的缺席	曹七巧与姜家女眷
笋干	黄杨木栏杆里晾着的笋干	被“晾着”、被冷落	曹七巧在姜家的处境
蜜层糕	七巧为季泽夹点心（玫瑰+青梅）	爱情的甜蜜与虚幻	曹七巧对姜季泽的爱
酸梅汤	七巧打翻玻璃杯，酸梅汤滴漏	爱情终结、心酸痛楚	曹七巧对姜季泽由爱转恨
饺子	季泽诱骗七巧时蘸醋吃饺子	虚伪的从容、蓄谋已久	姜季泽欺骗曹七巧
盖碗茶	七巧识破后端起盖碗茶吸一口	失望与清醒	曹七巧对姜季泽彻底绝望

由此可以说，饮食在《金锁记》中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背景元素，而是一套以味觉写爱情的完整隐喻系统。每一种食物意象，都精准地刻录了曹七巧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或某段关系，构成了她命运的味觉地图。

23)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15页。

24)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16页。

4. 《金锁记》饮食书写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人类上层的精神文化是取决于基层的物质生产体系的²⁵⁾。饮食，从来都不只是一种生物本能，而是关乎人对万物、对他人、对自我的伦理认同与价值判断²⁶⁾。饮食，也不单纯发生在人与食物之间，还发生在人与食物来源的社会之间。张爱玲笔下大多是20世纪40年代的小人物，所揭示的是大时代背景下和家庭伦理关系网中这些小人物的悲哀与苍凉²⁷⁾。在《金锁记》中，食物是人物命运的重要媒介——张爱玲通过人物与食物之间的关联性，阐述了人物命运及其关系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人物背后隐匿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

1) 曹七巧：从“被食者”到“食人者”

在叙述曹七巧“被食”时，以“麻油店出身”为起点。小说一开始就提到“麻油”，而且还是丫环小双和风萧对曹七巧的家世进行讨论，更突出早期的曹七巧身份卑微，下人都可以随便议论。虽然有着二少奶奶的名分，实则不过是个丫环，整日守着瘫痪的丈夫，伺候他的饮食起居。曹七巧出场前，姜家二小姐为给老太太做糖核桃，拿着钳子磕核桃。大太太（玳珍）、三太太（兰仙）坐下来一起帮忙她弄，还有说有笑，场面一片和谐。再到曹七巧第一次出场的描写，她的出场可以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进行对比，一方面体现了她有着王熙凤一般泼辣的性格，另一方面前后俩场景形成鲜明对比，更突出曹七巧“被食”时的处境。曹七巧出场后，大家都在明嘲暗讽她，比如在曹七巧吐槽完自己住的房子很小以后，兰仙（三太太）就讽刺她“二嫂住惯了北京的屋子，怪不得

25) 杨颖育，〈谁动了我们的“食物”——当代美国生态文学中的食物书写与环境预警〉，《海外文坛·当代文坛》第2期，2011，第113-116页。

26) 辛彩娜，〈乔伊斯的食物书写〉，《外国文学》第6期，2019，第127-135页。

27) 李洪源，〈“归化”与“异化”间的含混——《金锁记》的自译改写与海外传播〉，《华夏文化论坛》第2期，2022，第319-325页。

嫌这儿憋得慌。²⁸⁾”后面作者对“笋干”这样写道“黄杨木栏杆里面放着一溜大簋子，晾着笋干²⁹⁾”。这里的“笋干”也暗指曹七巧被人“晾着”、冷落。“被食”阶段，曹七巧被兄长当作货物麻油一般“出售”到姜家，麻油店的身世成为她被鄙夷的标签。

“自食”阶段则是以酸梅汤的滴漏展开叙述，标志着曹七巧爱情的幻灭。曹七巧起初对姜季泽尚存一丝幻想，然而，姜季泽暴露了真实面目，七巧识破之后，“她端起盖碗茶吸了一口³⁰⁾”——这一口茶的吞咽，是失望的吞咽，亦是清醒的开始。最终，曹七巧拿团扇打翻玻璃杯，酸梅汤的倾覆，宣告了她对姜季泽的爱情在此刻终结。曹七巧从自我欺骗中苏醒，开始“自食其心”——以清醒的痛苦消化曾经的爱。这是她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精神断裂。从此，她不再对任何人抱有幻想，也从此，她将自己封入了以金钱筑就的牢笼之中。可以说，“自食”阶段的曹七巧，并非变得麻木，而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清醒看透了人情世界的虚伪本质。

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对立面就是自己的父母，尤其是在小家庭中，不让孩子做这个干那个的都是自己的父母³¹⁾。获得经济权力之后，曹七巧转而“食”自己的儿女。她对儿子长白的控制，微至饮食起居——“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她教长白为她烧鸦片，以母子共处的烟榻时光侵占他的婚姻生活。长白娶了媳妇芝寿之后，七巧不仅每晚将儿子叫去点烟聊天，使媳妇芝寿独守空房，更是将长白招认的夫妻床第之事当作牌桌上的谈资，四处张扬。对儿媳芝寿，七巧不闻不问，硬是将其折磨至死。第一个儿媳尚未咽气，她又张罗着替儿子续弦，第二个儿媳嫁进门不久，亦被她折磨致死。两次婚姻的失败，使长白不敢再娶，只好终日在妓院游荡。

对女儿长安，七巧的“食”则更为隐蔽而彻底。她先是对女儿的婚姻表现冷

28)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2页。

29)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1页。

30)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15页。

31) 咸立强，〈从脚谈起：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怨女》的身体书写〉，《中国文学研究》第4期，2024，第131-141页。

淡，待到长安与童世舫恋爱起来，她又以“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对其进行破坏——先是怀疑童世舫的清白，污蔑其婚姻目的，后又故意向童世舫透露长安吸食鸦片的过往。她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席间仿佛不经意地说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³²⁾”。一顿饭的工夫，便断送了女儿本已到手的婚姻幸福。可以说，七巧对长安的“食”，并非出于恨，而是一种变形的占有——她不能容忍女儿获得自己终其一生未曾得到的幸福。

从“被食”到“食人”，曹七巧完成了一个悖论式的循环。她在姜家被欺凌时，曾经说过：“我要是好欺负的，早给作践死了³³⁾”。然而当她掌握了金钱与权力，她用来“不作践自己”的方式，却是去作践他人——尤其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正如小说的张爱玲所言：“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³⁴⁾”。饮食在此的意义，已不仅是“食”的隐喻，更指向了一种精神性的吞噬——七巧以爱之名、以保护之名，完成了对他者生命意志的剥夺。曹七巧的“食人”，既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封建旧家庭制度下女性命运的极端呈现：被压迫者最终成为压迫者，受害者的反抗竟走向了以伤害更弱者为代价的歧路。

2) 姜季泽：饮食行为暴露的虚伪本性

对姜季泽的形象描写很是生动，张爱玲先是借丫环小双的嘴叙述：“三爷自己在外头流水似的花钱。欠了公帐上不少，也说不响嘴。³⁵⁾”把姜季泽的经济地位以及自私、无赖的形象呈现；随后对其外貌特征进行描述：“脑后拖着一根三

32)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30页。

33)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10页。

34)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32页。

35)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2页。

脱油松大辫”、“一件竹根青窄袖长袍”、“酱紫芝麻地一字襟珠扣小坎肩”³⁶⁾。寥寥几笔便将一位风流倜傥、偷奸耍滑的富家公子形象展现于读者面前。然而，姜季泽的完整面目，并非仅靠衣饰勾勒，更是通过三次饮食行为层层暴露的。第一次，妻子为他剥核桃时，他只一味地吃核桃，无视妻子的撒娇。核桃在此处暴露了他的自私；第二次，他临走时抓了一把核桃仁，连吃带拿，贪婪之相毕露；第三次则通过描写他一边哄骗曹七巧卖掉田产购买他的房子，一边平稳从容地夹起饺子蘸醋，这一细节，将他的虚伪彻底定格。三处饮食细节，由自私而贪婪而虚伪，构成了一组递进式的人格暴露。可以说，姜季泽的身上，没有一处是靠直接陈述来完成的，张爱玲全以食物行为的白描，让读者自己“吃”出一个男人的无耻嘴脸。

5. “食”的隐喻系统与女性命运

孟悦和戴锦华曾在其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评论说：“张爱玲的世界毕竟是一个女人的、关于女人的世界³⁷⁾”，这与张爱玲的原生家庭紧密相关。她的父亲是典型的封建遗少，其母亲在张爱玲四岁时就把她交给姨奶奶看管，和张爱玲的姑姑前往法国留学，而法国是女权主义思想的起源地，她们在法国生活中自然潜移默化受到了女权主义思想的熏染。所以。她的母亲很早把她带入教会学校上学，她很早就学习了西方的音乐、文学等。夏志清认为《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之所以能极其深刻，是因为张爱玲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洋小说的影响³⁸⁾。克雷齐在《心理学纲要》里说：“早年的经验，特别是童年时期的经验，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定势，给审美知觉以强大影

36)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5页。

37) 孟悦，戴锦华曾，《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第260页。

38)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43页。

响³⁹⁾。”因此，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思想离不开其家庭背景和西方教育的影响。

1) “食”的隐喻系统

然而，张爱玲的女性主义并非一种乐观的解放叙事。从曹七巧一生的生命轨迹，可以归纳出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思想为“被食—自食—食人”的三阶段循环式。“被食”，指女性作为宗族交换体系中的“物品”，曹七巧在进入婚姻时便已被剥夺了自主权——她被兄长当作换取聘礼的筹码，“嫁”入姜家的那一刻，她的人生便不再属于她自己。“自食”，则是女性在意识到自身处境之后，所经历的心理撕裂——曹七巧从自我欺骗中苏醒，以“自食其心”的方式消化痛苦。酸梅汤的滴漏，正是这一阶段的精神标记——她不再幻想被爱，也不再信任任何人。“食人”，是指获得权力后的人将曾经的创伤以“食”的形式传递给其他人。

“食人”亦为鲁迅文学的核心母题，但张爱玲的“食人”叙述手法却不亚于鲁迅。张爱玲在《金锁记》中仅用一个场景——曹七巧半蜷在烟铺上，用小脚轻踢儿子长白的后颈，于月光下诱他说出与妻子芝寿的床第之事——便将鲁迅在《狂人日记》乃至整部《呐喊》中反复书写的一组“食人”主题浓缩于一帧画面之中。鲁迅这组“食人”主题至少包含五个相互缠绕的层面：(1)“人吃人”——以礼教为工具的系统性吞噬；(2)“吃自己人”——吞噬发生于家族内部、至亲之间；(3)“自己也在吃人”——受害者同时是施害者，批判包含对自身的审查；(4)“男吃女”——以礼教之名施行性别压迫；(5)“女人帮男人吃女人”——女性内化父权逻辑后，成为压迫同性的同谋者。曹七巧以母亲的身份行使了本属于父权的暴力，儿子长白则充当了她传递这种暴力的导线——两人在鸦片烟雾中的“亲密”，实质上是两代人共谋完成的对另一个女性的精神处决。⁴⁰⁾如果说鲁迅以日记体的碎片化书写拆解了礼教的运作机制，那么张爱玲则用一场高度浓

39) [美]克雷齐等著，周先庚等译，《心理学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135页。

40) 许子东，《许子东细读张爱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第136页。

缩的室内戏，将这套机制从抽象批判拉回到一具被谈论的女性身体之上——芝寿的床，既是叙事的焦点，也是她无声的刑场。受害者的反抗并未通向解放，而是走向了对更弱者的掠夺。

这一思想的核心悖论在于——曹七巧的“觉醒”并非通向自由，而是从受害者转变为加害者。这正是张爱玲对女性主义叙事的独特悲观主义改写——她不相信压迫被解除之后人会自动变得善良，也不相信权力的获得会自然带来解放。在她笔下，被压迫者一旦掌握了压迫的工具，往往成为更为决绝的压迫者。由此，《金锁记》所呈现的，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女性觉醒，而是一种关于女性命运深层困境的哲学追问。

2) 芝寿与长安：饮食缺席者的命运

与曹七巧形成对照的，是小说中的另外两位女性——芝寿与长安。她们的命运，同样可以通过“食”的隐喻得到解读。芝寿，是曹七巧的儿媳，然而在小说的饮食书写之中，她几乎是一个完全缺席的存在。为数不多的食物描写，也都是侧面。例如在描述新妇独守空房时，张爱玲这样叙述：“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⁴¹⁾”用“喜果”来讽刺曹七巧夜夜叫新郎长白为其点烟让新妇独守新房的荒谬行为。她的婚姻生活中没有食物的描写——没有她为丈夫做饭的场景，也没有她坐席用餐的画面。这一饮食书写上的空白，并非张爱玲的疏漏，而恰恰意味着芝寿在文本中的“空洞化”，这种个体生存悲剧所呈现出的苍凉美而非悲壮美的美感，⁴²⁾更突出曹七巧变态扭曲的心理，因为自己没有获得幸福的婚姻，所以喜欢无声地吞噬别人的幸福。

长安则不同。长安接受过学校教育，有自己的想法。在意识到母亲会阻挠她与童世舫的婚姻之后，她没有像芝寿那样被动承受，而是主动找到童世舫，

41)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22页。

42) 李掖平，〈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2006，第42—46页。

提出分手，变成朋友。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这是一种拒绝被“食”的姿态——女性开始自己决定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而不再仅仅是父母的附属品。然而，长安的拒绝并非一次彻底的胜利。她与童世舫分开后，虽“认真地做起朋友来⁴³⁾”，但终究未能摆脱母亲的阴影。小说最后写道“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⁴⁴⁾”。这话看似平淡，却暗含着一种无奈的宣告——长安的一生，终究还是在母亲的规定之中。芝寿的“空洞”是旧式女性无声的悲剧，曹七巧的“食人”是觉醒后的扭曲力量，而长安的“拒绝被食”则是一场尚未完成的挣扎。

因此，三位女性——曹七巧、芝寿、长安，分别对应了“被食”、“缺席”、“拒绝被食”三种女性命运类型。她们共同构成了张爱玲关于女性命运的完整图谱，从被动的牺牲，到无声的湮灭，再到有意识的反抗——但这反抗，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体制下也仅仅是苍凉中的一线微光。

6. 结语

从《金锁记》辐射到张爱玲的整体创作，可以归纳出她饮食书写的三大特征。其一，以日常写宏大，通过食物这一日常生活的最小单元，切入权力、性别与欲望这些宏大命题。在张爱玲笔下，我们可以通过一粒核桃看出一个男人的自私，一碗酸梅汤宣告一段爱情的终结，一碟饺子揭穿一场蓄谋已久的骗局；其二，“食色性也”的现代重写。以《金锁记》为例，“食”在文本中承担着远超出物质层面的功能：它构成了“性”的替代性书写策略。食物意象并非偶然的装饰，而是情欲的转喻——在那些被压抑的人物那里，口腹之欲的描写常常泄露了不便明言的身体渴望。这一置换之所以有效，恰恰在于它建立了一条可追溯的逻辑链：压抑的社会语境迫使欲望寻求出口，物质性的“食”成为身体最安全的言说通道，文本表面的饮食描写因此始终承载着情欲的暗涌。正因如此，张爱

43)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30页。

44) 张爱玲著，《经典手抄本·金锁记》，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第32页。

玲以日常之物写人性深处的笔法才不是一种修辞偏好，而是一套有说服力的叙事机制——她让读者在剥开一层层食物描写的纹理时，触到的是人物最隐秘的心理真相；其三，饮食作为女性书写权力的隐喻——在被男性话语主导的文学传统中，“写食”成为女性作家夺回书写主体性的一种策略。张爱玲以食物为语言，在厨房与餐桌这些被男性文学视为“琐碎”的空间里，建立起了属于女性自身的叙事疆域。

《金锁记》的饮食书写，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爱情隐喻系统。从麻油到酸梅汤，食物见证了曹七巧从“被食者”到“食人者”的全过程，这是张爱玲对中国现代女性命运的一次味觉式审判。小说开篇，“麻油”便暗指了曹七巧被当作货物出售的命运；而在小说的情感高潮处，酸梅汤的滴漏宣告了她对爱情的彻底绝望。在这一头一尾之间，蜜层糕的甜、饺子的伪、盖碗茶的清醒，共同刻录了一个女人如何在饮食的流转中，完成了从寄望于爱到封存于金的全部心路。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将《金锁记》中分散的饮食意象整合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路径；其次，将“食物隐喻”从背景描写提升为叙事结构的核心要素，揭示了食物书写在《金锁记》中不仅是修辞手段，更是结构性的叙事动力；最后，在女性主义批评与饮食文化研究之间架设了“爱情隐喻”这一中间桥梁，弥补了既有研究将二者分别讨论的不足。

然而，本文仅以《金锁记》为个案，尚存局限。张爱玲的其他作品，如《倾城之恋》中的“墙”与“吃”、《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振保辗转于女性之间的“二分法”欲望，同样蕴含着丰富的饮食书写资源。未来的研究，可将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系统性地梳理，进一步对比总结其饮食书写的特点。

综上所述，《金锁记》的饮食书写，不仅是张爱玲文学技巧的集中展演，更是她对现代女性命运的一次深度追问。她不去写战争与革命，却在糖核桃与酸梅汤之间，写出了时代的苍凉。正如小说结尾所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未完的故事，或许正在于：只要饮食还在餐桌上，那些隐藏于味觉深处的欲望、权力与性别，就永远值得被重新品味。

參考文獻

- 강승미, 〈장아이링 소설의 내러티브에 대한 연구〉, 《중국문화연》 제23집, 2013년.
- 박재범, 〈张爱玲의 《传奇》, 모더니즘 소설로서의 서사적 성격〉, 《중국소설논총》 제33집, 2011년.
- 유민희, 〈여성의 삶,그 쓸쓸함에 관하여 - 장아이링(张爱玲)의 《금쇄기(金锁记)》 재독(再读)〉, 《인문학연구》 제97집, 2014년.
- 陈平原, 〈长向文人供炒栗: 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 《学术研究》第1期, 2008年.
- 陈益源(主编), 《谁识食滋味: 文学与艺术中的饮食符号》, 台北: 财团法人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 2013年.
- 段绪懿, 〈论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形象〉, 《名作欣赏》第16期, 2009年.
- 傅雷, 《傅雷文集》第4卷, 合肥: 安徽出版社, 1996年.
- 甘哲瑾, 〈张爱玲小说中的饮食书写研究〉, 长江大学硕士生毕业论文, 2025年.
- 卡罗琳·考斯梅尔(著), 吴琮等(译), 《味觉、食物与哲学》,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1年.
- 克雷齐等(著)·周先庚等(译), 《心理学纲要》,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 李洪源, 〈“归化”与“异化”间的含混——《金锁记》的自译改写与海外传播〉, 《华夏文化论坛》第2期, 2022年.
- 李欧梵,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
- 李奇志, 漆咏德, 〈论张爱玲的“食”之叙写〉, 《理论月刊》第12期, 2019年.
- 李掖平, 〈生存悲剧的苍凉书写——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2006年.
- 林幸谦, 〈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 《社会科学

战线》第2期, 1998年。

玛丽·道格拉斯(著), 黄剑波等(译), 《洁净与危险》,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年。

孟悦, 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宋声泉, 〈在“男女”与“时代”之间——重论《金锁记》〉,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59卷第4期, 2020年。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 《中国现代小说史》,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79年。

咸立强, 〈从脚谈起: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怨女》的身体书写〉, 《中国文学研究》第4期, 2024年。

辛彩娜, 〈乔伊斯的食物书写〉, 《外国文学》第6期, 2019年。

许子东, 《许子东细读张爱玲》,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

宣钉奎, 〈张爱玲小说的男性与女性的本位〉, 《国际文化研究》第2卷, 1985年。

严家炎,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

杨颖育, 〈谁动了我们的“食物”——当代美国生态文学中的食物书写与环境预警〉, 《海外文坛·当代文坛》第2期, 2011年。

曾参·子思(著), 严亚珍(译), 《大学·中庸》,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9年。

张爱玲, 《经典手抄本·金锁记》,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3年。

Abstract

The Shackles of Taste

— Food Writing and Women's Fate in Eileen Chang's *The Golden Cangue*

Ou Yeye

The Golden Cangue is a novella by Eileen Chang, which delicately portrays the tragic fate of Cao Qiqiao, who transforms from being “consumed” to “consuming others” under the old feudal family system. Previous studies on *Golden Cangue* have generally focused on analyses of Cao Qiqiao's character and discussions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whil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food culture within the novel remain scarce. The frequently appearing food imagery in *Golden Cangue*—sesame oil, candied walnuts, dried bamboo shoots, honey-layered cake, sour plum soup, dumplings, and lidded bowl tea—is not merely incidental background props but constitutes a complete metaphorical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food writing as an entry point to conduct a close textual reading of seven food images in *Golden Cangue*, revealing how Eileen Chang employs the superficial cultural phenomena of “food” and their underlying metaphors to depict characters’ romantic relationships and the fate of women. On this basis, by contrasting the “food absence” fates of the two women, Zhi Shou and Chang'an, this paper explores Eileen Chang unique strategy in portraying female characters. It argues that Eileen Chang uses food as a language, building a metaphorical bridge between taste and emotion, and portrays the depths of human nature through everyday objects, thereby accomplishing a gustatory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modern Chinese women.

Key words : Eileen Chang, *The Golden Cangue*, Food Writing, Theorizing feminism, cao qiqiao

투 고 일 : 2026. 7. 10. / 심 사 일 : 2026. 7. 15. ~ 2026.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6. 8. 20.